

全球化与不平等：概念化与解释的论题

格兰·瑟本*

Abstract: The conceptual part of the paper specifies globalization into global processes, of the enduring weight of global history, of global flows of goods and services, of capital, of people, and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and, finally, of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national and global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ogether with national processes this set of processes make up an explanatory model of global outcomes of inequality. Inequality is specified into three kinds, vital, existential, and resource inequality, and four basic mechanisms of inequality are identified, distancing, exclusion, super/subord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explanatory model is then applied to long-term developments of vit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world. The former, as measured by infant mortality and life expectancy, has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whereas income inequality has widened. Global flows of medical knowledge seem to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reducing vital inequality. The weight of global history, measured by GDP per capita in 1820 and in 1900, and national process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ppear to account for most of today's global resource inequality.

本文的标题涉及三组基本论题,这些论题在社会科学家中仍然争论不休,更不用说在一般公民中了。其中两组论题是概念或理论的,另一组既是概念的,也是经验的。

首先,全球化是什么?应当如何对它进行理论概括?

其次,可以区分出什么类型的不平等?什么不平等是关键?在不平等的产生中涉及什么样的基本社会进程?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正在观察与经历的全球不平等的后果应当如何解释?什么力量与进程应当为它们负责?

这三个问题中没有一个有直接答案,虽然人们期望获得这样的答案。本文目标是:澄清可能的答案及其意义,论证某种概念—分析观点,为一种有关世界不平等产生的多面解释提供经验证据。全球化与不平等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哲学的两个十字路口。本文作者以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的背景来处理它们。

一、全球化是什么?

基本上,对于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最明显与最简单的是,全球化是任何你想要它存在的东西。这是首尾一贯的唯一论答案。概念只是工具,不是本质。然而,这个答案还得有两个直接保留,一个涉及沟通,另一个涉及认知。如果你要与他人沟通,特异的原始定义可没有什么价值。其次,新概念的使用应当为它们对新知识的贡献而受到激励。全球化概念最好指谓这一世界上某种新的东西。

第二个好答案将全球化概念置于实际流行话语中,由此也许可以继续澄清单个的定义。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概念已经出现在至少5种类型的大量话语中。

中心的类型是经济话语,诉诸贸易、投资、生产和企业的新模式。第二个普遍类型,通常从第一个里

* 格兰·瑟本(Goran Therborn)系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委员会(Swedish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主任,本文是他为2003年将在北京举办的IIS会议提交的论文。——编者

导出,是社会—政治话语,着重在国家和国家管辖的社会的作用的缩小。第三,全球化已作为社会批判话语和抗议的中心出现,作为新的、现存形式的敌对力量,作为社会正义和文化价值的惟一敌人出现了。更具体也更有意义的是另外两种话语。一个是文化的,涉及人类学和文化研究,将全球化视为文化流动、文化邂逅以及文化交织。最后,以全球责任的形式,全球化是生态话语和地球环境关注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语都会受到其自身机制的驾驭,却很少或没有关注其他话语。

对于全球化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第三个答案是一个自我反身性的答案,它说:全球化被以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但是,出于社会科学分析的目的,我认为这个答案是成果最丰富的,出于以下理由。

在这一脉络里,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定义。作为社会理论和分析的一个概念,全球化应当满足三个标准。它应当有精确的意义,最好不是语义学上的任意的意义。它应当是在经验研究中有用的,而且它应当有广泛的可能应用。第三个标准意味着,这个概念必须是抽象的,不包含任何有具体内容的后验陈述。在这些考虑的基础上,我想这样定义全球化会是成果丰富的,即认为全球化是社会现象向世界范围扩散、影响、或者关联的趋势,或者在社会行动者中对于世界包容性的意识。这个定义近似于全球化这个字眼的词源。这使得这一概念成为经验变量,这一经验变量的出现可能会被确认,也可能被否认,还可能被从原则上加以考量。这一概念对于可能的全球化具体模式是不可知论的与广泛开放的,对于全球化是好是坏的问题也先验地不承担义务。

但是全球化不只是概念。它也是分析的,或者更宽泛地说,推论的焦点或者角度。因此,它被用在某些主要的世界观里,这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加以把握。一个维度我们可以称之为维度性(dimensionality),它指的是全球化的现有内容是如何被感知为一个压倒一切的、基本的、首要的东西——经济的、文化的、或者生态的东西——或者被感知为不可化减的、可能互相矛盾的多面体。另一个维度可以被称为历史性(historicity)。全球化被视为在现代人类历史上构成了基本的断裂,并且,作为其他选择,现行的全球化要么被视为过去历史现象的新浪潮,要么被视为总在进行中的社会变迁过程的现行表现。

在这四个关于全球化的主要立场中,第四个立场具有最为认知性的前景。它的历史途径导致成果丰富的历史比较研究,所以也许最清晰的是从19世纪后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化浪潮,但也包括更早的浪潮,从“世界宗教”的建立和美洲的征服开始以来的进程。现有的浪潮包括多少断裂作为一个经验问题仍然是开放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复杂与谨慎并不总是科学美德,真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是集中注意一种类型现象的全球化会丧失对于不同的、与之冲突的全球进程的洞察力,例如,关于资本主义、关于文化、关于规范性(人权)的洞察力。

表1 全球化的世界观点

历史性	维度性	
	单维度	多维度
单一性	1. 经济/文化断裂论者	2. 社会学断裂论者
复发性	3. 经济历史学家	4. 社会学历史学家

注:这一图表受到约翰·古德索普(John Goodthorpe)于2000年10月在我们有关不平等的全球进程的讨论班上发表的类似观念的激励。

全球化作为一个变量可以包括无穷数量的社会生活侧面。它可以有不同的扩展程度,从仅仅多个大陆到严格的整个星球。它可以为不同的机制所驱动。总之,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过程的多元性,并且这个字眼因此最好以复数来表示,诸全球化(globalizations)。

全球化的多维度性可以由一组关键社会变量来解释,我发现这些变量作为比较社会研究中系统性范围的简化(例如,Thebom, 1995)很有用,在这一方面,全球化需要:

社会结构化过程,例如,劳动分工,权利分布,财富与收入的分配,风险与机遇随时间变化的模式。

它也可能包括文化适应的过程、身份塑造的过程、知识定义与分配的过程、价值构成与规则制度化的过程、象征形式构成与接受的过程。

第三,全球化可能涉及社会行动,涉及单向行动或互动、分散的个人或集体行动,涉及和谐或冲突。

这些全球化的机制可以被视为要么是互动的或者系统的,由外源或者内生塑造的行动者实施,或者作为两者的混合来实施(深入了解可参见Thebom, 2000a)。

但是,为了理解全球化作为原因性力量的作用,我们最好将它具体化为一组全球或跨国家的过程。

为了解释世界之不平等,至少有三个类型的此类过程似乎至关重要。一、过去跨国家历史对行动者及其环境的模塑;二、贸易、资本、人员和信息的现行流动,及本土和全球行动者和机构的现行关联或重叠。

现行的全球化不是历史上惟一的,除非在琐碎的意义上把每一事件称为惟一的。在迈向全球范围与影响的趋势的意义上,我想我们可以区分出至少六个主要历史浪潮,第一个是世界宗教的扩散与跨大陆文明的建立,集中在4至7世纪。从此,所有的浪潮都在某个时候消耗殆尽。随之而来的是或长或短的去全球化时期。但是一个浪潮并不紧跟另一个浪潮,也不从另一个浪潮里产生,这意味着一个浪潮的收缩可能伴随着另一个浪潮的兴起。

就我所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存在循环性东西的证据,但是这些浪潮确实会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它们全是多维度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力量与过程,与此同时,每一浪潮还有一个支配性的动力机制。迄今,这些浪潮的兴起来自自主的行动者扩展其影响的过程,而不是来自系统过程的强化。但是每个浪潮倾向于创造一种特定的全球系统性,它可能是一个世界宗教文化,一个帝国,一个世界市场,或者一个世界冲突体系。当浪潮消退时,甚至当浪潮跟随着去全球化阶段时,这一系统性会削弱甚至消失(Therborn, 2000a)。换句话说,没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的全球化是社会历史的终点站。

二、什么东西的(不)平等?在什么人中间?如何进行?

没有什么时候平等是无特权人们中的自明商品。平等主义者得在个人与文化多样化面前,在与个人主义、差异、多元性、多元文化主义和遗传主义的回归的关系中为他们的案子辩护。在此,完全道德的论据将不被尝试,而后继者从一条道德公理出发,认为每个人有着基本相等的价值。然而,如果假定这一平等人类价值的伦理前提并且假定大量人类不同状态的经验事实,那么什么不平等在社会与道德上是重要的?

我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系从人类能力中导出的,涉及人类的功用与作为,也是从社会设计能力中导出的。前者已经由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92, 2000)提出,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平等主义观点来替代功利主义,认为不平等涉及生活的质量,涉及个人存在与作为的能力。后者作为一个原则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理论化,但是它诉诸人的超遗传的文化能力来创造差异巨大的可行社会。^①

在此值得强调的是,从新的能力途径里产生的结论是基本不平等的根本上的多维性。即使全球化被缩减为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相关的(不)平等的全球进程也不能缩减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布或者个人或家庭收入的分布,无论这些东西如何重要。从森的一般论述中,你可以走上特定具体指标的方向,像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及其人类发展指标^②中,或者走上起草“中心能力清单”的方向(Nussbaum, 2000: 78—80)^③,这是“生活水平”成分的替代物。^④

但是我们有时也会进入较低的抽象水平,呆在普遍分析理论的基础上,目的是得到某些比一组指标或者一系列长长的要素清单更普遍和/或更容易处理的东西。能力的不平等,或者用经典概念来说,生活机会的不平等,可以被我们作为资源和环境的总和。资源和环境是关于达到存在与作为的能力的,个人有理由高度评价这一能力。但是当资源可以个别地分配时,环境就标示出进路脉络和选择可能的缺乏或者存在。反之,我们可以把有关的环境再细分成生命的和存在的,前者涉及人类有机体的环境,后者

① 在结构马克思主义里,阶级结构,及其核心的剥削概念,总是不平等的焦点。“设计能力”清楚地区分个人流动机会与即定地位结构,是同样概念的更加政策取向的阐述,涉及关于可变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新近的主要重述(Fischer et al., 1996)。

② 人类发展指标包括生命预期、教育成就(文化水平加中级高级教育的升学情况)和(折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购买力计算)。

③ 诺斯鲍姆的清单包括:生命,平均长度,身体健康,身体完整,免受谋杀与性或生育的犯罪侵害;感觉、想象和思考,即,能够以“真正人的方式”使用这些能力;情感,能够有依恋,有自由免于过分恐惧和心理创伤;实际理性,即能够形成商品概念;从属关系,包括自我尊重和不受羞辱的社会基础;其他物种,能够关注自然地生活;游戏,能够笑,玩和放松自我,控制自己的环境,政治的与物质的。

④ 也可以从瑞典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生活水平调查中抽取相关的、经验上可处理的不平等清单,有十个组分:营养、健康和健康护理的获得,就业和工作环境,经济资源,知识和教育的获得,家庭和社会关系,住房和邻里服务,休闲和文化,生命和财产健康,政治资源。

涉及人类存在的环境。

简而言之,我因此论证在人类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最为重要的不平等。

生命不平等,首先是生命预期和健康的所有不平等,但也可能涉及其他环境及其分布的生命质量。

存在不平等是社会、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可以与人类个体之间的存在差别相区别,在它是范畴的与制度化的范围内。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种姓或者阶级的社会等级结构是明显的例子。

资源不平等涉及某一社会系统视为有价值的资源的分布,例如,土地、骆驼、教育、金钱。它也包括社会规划权利,无论这样的权利是血缘义务还是福利国家授予的资格。

在关于全球收入分配的文献中,正存在着关于是否这一分配应当根据现行汇率或者根据国内购买力来测量的争论,国内购买力由所谓购买力类推(PPS)来估计。这一论题不仅是技术性的,因为这两个测量对世界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提供了非常不同的图景。根据汇率,富国与穷国的鸿沟在20世纪最后十年极大地加深了。在1960年,构成世界人口最富的五分之一的那些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穷五分之一国家的30倍,在1990年,是60倍,在1997年是74倍(UNDP, 1999: 3)。但是,以PPS计算,富国对穷国的倍数从1965年的15倍下降到1998年的13倍(计算出自Melchior et al., 2000: 45)。出于比较户均经济资源的大多数目的,国内购买力是最佳的测量指标,但是它的估算对于方法论疑问是开放的,对于某些分析,例如债务负担和国际贸易与旅游的情况,实际汇率是更恰当的(参见Wade, 2001)。

1. 什么人之间的不平等?

关于不平等的所有讨论都涉及特定种类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这值得注意是因为有关的种类是可变的,并且确实随着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而变化。血缘群体,如家庭、家族、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和在更广泛的职业群体,如种姓、社会阶层、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过去引起关注。而国家、性别、年龄群体、宗教之间的不平等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之间的不平等则引起了现在公众的兴趣。在几乎无限的潜在种类中,只有相对少数的种类已经成为与本论题相关的了。肤色是,而头发或眼睛的颜色几乎不是;种族群体的后裔是,而殖民群体的后裔几乎不是,不同省份或城市的后裔也不是。个人职业之间的不平等经常被认为是重要的,但是出生年份之间的不平等——例如那些出生于1940年的与那些出生于1946年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几乎就不重要,较宽的年龄群体和代际之间的不平等重要,而例如29岁和37岁之间的不平等就不重要。然而,经常使用的比较的数目已经足够大到需要相互竞争以引起注意。

当然,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全球人类之间的不平等更加引人注目。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主义才把国家间的不平等带入人们的视野。全球化的现行潮流开始把其他种类带入全球比较,那就是世界妇女、儿童、户。

世界收入的分布不一定相同,如果我们将它视为国家之间的分布的话,例如人均GDP,或者如果我们观察全球户均收入的话。国家间和国家内的发展可能差别巨大。从1965年到1992年国家间的不平等显著增加,而国家内的不平等总体上趋于减少。前者是两者中更强的(Korzeniewics & Moran, 1997: 16)。在1990年代,主要的趋势正好相反,人口最多的穷国,中国和南亚,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增长赶上了一大块,但是国内不平等的增长是压倒性的并把世界不平等推向前去(Cornia, 2001)。

但是,也存在其他论题。个人和户是社区——种族的、宗教的、地域的或者其他定义的——的组成部分,而社区间的不平等是许多人们正义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国际学术和政策文献中经常被忽略(Kanbur, 2000: 825)。另一方面,国际注意力近来日益关注户内不平等,特别是男孩与女孩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平等。

关注不平等,与关注贫困不同,是对整个社会如何构造的关注,而不仅仅是关注最不幸的后果。^①

^① 需要强调 国际机构对于贫困问题的日益关注本身与对不平等和社会组织作为人类环境的关注不是一回事。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下的智利在许多方面是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标靶,而智利政府对于1982—1984年国内经济危机的处理是值得注意的例子。毫不令人惊奇,政府的政策首先偏向最富有的10%的人。免除他们的债务达到GDP的五个百分点。同时,食品补贴也帮助了最穷的10%的人。受损失最大的是第二与第三个10%中的失业者和其他人(Bourguignon & Morrisson 1992)。在智利,不平等从1980年的基尼系数53跳到1989年的59(Londrino & Székely, 1997)。

这样,前者对于落伍的他们自身的自我组织和流动,对于社会冲突,对于大规模社会变迁就更合适,而后者则有着更自然的博爱取向。在平等主义者的政治中,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富人的不平等上,作为社会批判的靶子。然而,从道德平等主义的视点看来,可能会认为,穷人的不平等是最重要的,即,是变迁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穷人的不平等倾向于把他们排除出对主流社会的完全参与。

在此范围里,如果你同意后者的论证,这就有某些分析的意义。它使得相对贫困的测量作为不平等的测量变得特别贴切。在国家水平上,现在常常根据低于国家中位值一半的收入的人口比例来测量相对贫困。有时,也选择90%人口的中位值收入的比率来测量。虽然确实倾向于彼此有意义地相关,富人的不平等和穷人的不平等可能彼此独立地变化。拉丁美洲的异常不平等首先是最穷困的30%人口的不平等,他们的(相对)所得少于非洲或其他地方的同类人群。但是,特别是在某些国家,例如智利和墨西哥,也存在最有特权的10%人口的不平等(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8: 11, 16)。

2. 不平等的形式和机制

不平等的基本问题不应当只作为对于正义和自由的伦理反思的出发点而存在。它们也提出了有关社会组织的经验论题。那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不平等?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价值生产的模式,涉及定义有价值的资源和环境,确定它们的世代过程。

涉及价值生产的模式的关键问题包括被认为有较高价值的成就或者所有物的数量,其次,在什么范围内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彼此转换。如果存在一个超级价值,例如金钱,或者如果金钱和所有其他较高价值很容易彼此转换,我们就获得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一种虚拟的货币阶梯。如果存在两个或者更多的较高价值难以彼此转换,诸如,彼埃尔·布迪厄(1979)在经济与文化资源之间作出的区分,我们获得了其他的细分的不平等形式(参见Walzer, 1983)。

表2 不平等的基本形式

边界隔膜	初步分类	
	垂直的 (高级的/低级的)	水平的 (内/外)
单一的(垄断) 多重的(分化)	支配/两极化 层级	排斥/边缘化 分隔

结果的不平等形式可能根据社会隔膜(social closures)的数目,根据这一隔膜是否基本上垂直,是否将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隔离开,是否将局内人与局外人隔离开而予以细分。后一区分当然倾向于有某些重叠,局外人倾向于成为下层,但是并不一定如此,不同的着重点可以区分出来。

当支配通常意味着一种政治权力分割和一种经济资源和行动者取向的极化时,层级可能既是一种组织化结构,也是一种非正式的序列,例如收入。

单一隔膜的典型化的排斥当然可能排斥掉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参与到一个繁荣社会中去,或者把他们边缘化。公民权,或者说居住权——在给定地域中居住的合法权利——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排斥形式,而不是公平的分隔把异类与适合的居民分隔开。由于层级化和层级化地相互联系的世界的扩展,其重要性日益增加。

分割仍然是不平等的另一种形式,它主要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并且不必然要求任何绝对的隔膜。文化多元主义可能通过分割起作用,生活风格的分化也是如此。政治认同也可以被分割,正如排斥的另一种说法。

然而,关键问题更经常是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而不是不平等看起来是什么。社会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呢?为何有不平等被我们看见?

在这里我们需要考察的是那种产生特定结果分布的社会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看起来处于两极之间。在一极我们发现A遥遥领先于B,由于A更好的先天条件,更多的训练,更幸运的开始或者是更辛苦的努力。不是A与B之间的互动关系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差距,而A和/或B,正如他们的旁观者一样,可以发现其重要性。我们可以把这一极的情况称为疏离。在另一极,由于B提供给A的价值,A将这种不平等关系实施于B。这一极的不平等是由剥削造成的。剥削(更多讨论见Tilly, 1998)包含一种在高级与低级人群之间的绝对区分,后者为前者创造价值的原因,必然地是由于强者从弱者身上不平等

地,根据某种基准,榨取了不公平量的价值。

在疏离与剥削之间并非仅仅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我们可以辨别出另外两种产生不平等的机制。排斥意味着不包括其他群体的领先和进入。作为一种解释性的机制,排斥最好被看作是变化的,包括各种障碍,如同一道闭锁的门,而非一个像篱笆那样被置于某些人前面的绝对的范畴。我们也可以从一些高高低低的对社会行动者的制度化排列中抽绎出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威压与服从造成的。

这四种机制是累积性的,他们形成了一个一级一级的台阶,通向不平等的天堂或者地狱,取决于你关注的是哪一边,是受惩罚的一边还是受奖励的一边。排斥可能仅仅针对那些不能进入非其所属的群体中的人,他们不是那些群体的成员或公民,并不需要任何必要的垂直序列。然而对其他并非仅仅是分隔的不平等而言,排斥机制对某些人而言是有效率和重要的,排斥性和隐藏的障碍是由他们建立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领先于其他人,或是正处于某些对外部人有价值的事物的内部。排斥的一个普遍的方面是边缘化那些被排斥的人,他们从位于中心的那些价值观那里被排挤到有价值的社会的边缘。

被制度化的威压—服从要求把上层与下层的人 表 3 (不)平等的机制

分开,这必须被适当地考虑。这并非暗示有任何必然的按年代顺序安排的后果。这种秩序相当地合理,虽然没有威压—服从关系的排斥是可以设想的,这并不是某种兜圈子的说法。服从使从某种东西那里被排斥得以实现。剥削最终预设了疏离,排斥和被制度化的优越和劣等,并在最上面添加了从下等人那里抽取资源的说法。与抢劫和掠夺相反,剥削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互动。	不平等的	平等的
	疏离:例如遥遥领先	补偿性的能力获得
	排斥:进入障碍、路障、边缘化	包容
	威压—服从:制度化等级序列、种姓制、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	授权
	剥削:榨取资源	再分配

排斥、威压—服从和剥削都是可及于对象的不平等机制,与疏离相反,它们直接不利于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由于平等与不平等相反,我们可以预想有平等和等级化的机制与那些不平等的机制相对应。我们可以把它们列在一起。

对完全成熟的不平等产生理论而言,所形成的这些概念要求更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它们的相互关系、它们产生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形式,例如疏离可能与层级制或者两极化一样造成极化。但这些任务将留给另外的论文。在这里,我们将先来看看到现在为止被发展起来的这些工具是如何对这世界的的不平等做出某种解释的。

三、全球后果:民族进程还是全球进程?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平等的。在国家的人均GDP、家庭收入、性别收入、以及不同民族、阶级和性别的生活预期以及不同民族、阶级和性别的教育等方面都非常不平等。通过许多对资源、环境和前景的比较,全球的优势和劣势情况可以被排序。^①在1990年代中期,世界家庭中收入最高的10%的购买力是世界人口中最穷的10%的购买力的80倍(从Wade, 2001:表3计算得出)。我们这里没有包括超级富翁和乞丐,使用的是顶段的(略大于)六亿和底段的(略大于)六亿的数据。

然而,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是,全球产出是否是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全球产出并不需要全球生产。是否并且在多大的范围内如此是一个经验问题。一种先验的看法是,它们可能是当地或国家进程的结果,不同的资源、能量、技能和运气被当地或地方的行动者使用。全球不平等可以是全球规模疏离的结

^① 在一份与此论文相应的论文中,我使用了瑞典生活水平的十个组成成分来研究全球的情况。一份有关的草稿(Thebom, 2000b)在斯德哥尔摩外的Saltsjöbaden举行的会议上被提交。

果,一些地域的行动者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如果我与世界范围内的一些运动员赛跑,我肯定是最后一名。但这是我自己生活经历的结果——我是一名学者而非运动员,并不是因为竞技体育的全球化。

由于一些可以被处理的复杂性的原因,将所有亚国家的进程都包含在“国家”——在被边界分割的国家的意义上——题目下,许多的全球不平等都可以从全球的和国家进程的多种复合中显现出来。我们只列出主要的选择项:

表 4

主要的全球—国家复合造成全球不平等

1. 主要是国家力量造成不平等,国内的不平等进程加上国家间的疏离——由于不平等的增长和进步,还包括全球平等或不平等进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弱于国家的不平等的可能性。
2. 全球历史和国家的平等:通常与案例 1 中的情况相同,但考虑到所有存在的国家在本质上都是由超国家进程塑造而成的。
3. 主要是传递(性)的全球不平等进程,是关于排斥、威压—服从,和/或剥削的不平等进程,压倒了在平等方面的国家努力,或更进一步受到国家力量造成的不平等的支持。

这三种复合中的每一个都能够产生同样的全球不平等图景或标准。因此哪一个作为主要的解释都有着丰富的道德和政治涵义,虽然这个世界十足不平等——无论是什么起源,它应对每个相信人人都应该有美好生活机会的人以一种道德关怀。这个论题被认识到不平等可以有不同的种类弄得更复杂。我们没有理由先验地假定这世界生命、存在和资源的不平等都有着同样的动力。

1. 一个解释性的框架

为了着手研究如何解释全球不平等的论题,我们不得不从民族国家和跨国界国民经济与社会开始,将其作为生活水平的最初直接决定因素。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一个闭合的系统,而且其最初的地位可能正被侵蚀或已经被赶上,这地位是一定社会范畴中人的生活水平的决定因素。但这似乎是构造一个因果链的最适合的基石。公民权甚至居住权——合法居住的权利——的边界都决定性地影响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机会。经济和非经济的社会关系被不同国界的多个经济和社会显著地类型化。一般的民族国家都有很大的资源配置和再分配的能力,直接控制着所有最发达国家 $1/3$ 到 $2/3$ 的 GDP。

全球性从全球历史、全球扩展和全球卷入三个角度影响国家对人的能力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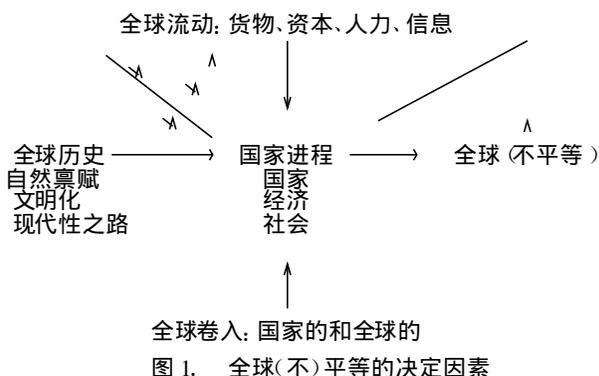
所有当前的民族国家和国家性的经济和社会都由外在于国家的力量和进程决定,包括人口的构成,文化的形成,边界的划定和在世界中的定位。全球历史高居其上。这就是世界体系分析和对通往现代性的不同路径的分析的入口。然而,沿着一条路或另一条路,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全球历史导致了拥有自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财富和动力——包括利用它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特定能力——的由国界限定的社会体系。这种动力学构成了配置和再分配的国家进程。

在世界中发挥一般功能时,国家受两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大多数直接往来是全球的,或至少是跨国界的货物、服务、资本和人的流动,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也不应被忘记。(对于生命的不平等而言,疾病的跨国界流动,例如历史上的瘟疫和今天的艾滋病也许同样是重要的)这些流动有自己特有的常规动力。无论它们的范围是什么:局域性的、民族性的、宗教性的或全球性的,它们本质上都是相同的。贸易和金融的市场动力决定链条的迁移,知识的扩散。这些流动有直接的分配效果,例如剥削性榨取,以及排斥或包容的交换,但它们对国民经济、社会和国家及其再分配能力的影响也随之而来。

第二种全球进程我们可以称作全球卷入。它指制度的重叠、不同行动者群体的相互纠缠,发生在国家与全球、区域与全球之间。这种卷入最切实的形式是资源丰富的全球性组织的出现,这些全球性组织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政治家以及运动,并与它们互动。最有力量的全球性组织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联合国国际组织一族,其中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最重要的。在富裕国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在欧洲则是欧盟(EU)和欧洲议会,在全球,超级强权的联盟在冷战期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可忽略——虽然相对边缘化——的是地域性的发展

银行。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来展示全球不平等——以及在世界中存在的平等——的生产。



这种方法旨在解决如何解释全球不平等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它的下一步是在考虑可信的对不同种类的不平等的重要性的条件下，先给这些解释变量排序。为了不使其一开始就过于复杂，让我们在这里先把注意力集中于生命(生活期望)和资源(收入)的不平等上。

第三类基本的不平等即存在的不平等这一论题，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登上了全球政治舞台。1948 年的《联合国全球人权宣言》、1965 年的《联合国消除各种歧视公约》和 1979 年的《联合国消除各种形

式的歧视妇女的公约》至少标志着关注存在的不平等开始进入世界政治的主流。但是歧视和侵害人权远未消除。

2. 世界史的重要性

全球历史意义重大地铸成了我们当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无须一一列举，虽然那些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可能需要详细说明。“自然禀赋”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地质学研究。在世界的生产和分配中它们的重要性已经由可利用的技术决定了。为了分析产出的分配，我们倾向于认为，“文明”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文化模式，宗教位于其历史核心；而通向现代性的道路^①则是另一些最重要的历史变量。

显然，今日大多数的民族国家都将其根源追溯至各种外部的跨洋跨洲的力量：所有的美洲国家，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除了几个局部例外，中国和日本是最具代表性的。伴随着社会破坏的殖民征服，种族的殖民性剥削——典型的代表是西属美洲的中心地带和 19、20 世纪的殖民地，但不包括北美种族灭绝性的殖民地、南美洲国家和澳大利亚——以及种植园奴隶制所产生的创伤性的持久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这些痕迹经常从其受益者的记忆中被抹去，他们的大本营在北大西洋沿岸和东北太平洋沿岸，并在今日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②

其历史遗产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通向现代性的路径加以分析，如内生的欧洲国家(主要体现在西北欧洲)、通过种族灭绝或殖民性被区别开的殖民者的新大陆和殖民地以及被挑战的反现代化国家(Therborn, 1999)。通过这种方式，针对当代区域特征的比较研究得以开展，例如(前殖民地的和非种族灭绝的)拉丁美洲的特殊的的不平等、南亚教育独特的精英主义、有特色的非洲城市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裂隙以及异乎寻常的非洲掠夺性国家。

但是为了探求历史对当代分配模式施加的重要影响，我们必须更系统些。那么，一个入手点可能是在考虑一些不平等的特别方面的情况下来看 20 世纪的记录。这里我们选择生命和经济的不平等。2000 年全球产出分配越类似于 1900 年，世界历史对其影响就越大。

许多国家在人出生时对其寿命的预期——寿命积累数据的表格——并没有很多年的统计。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对婴儿死亡率的统计——一个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的决定性的组成部分，虽然像一切历史数据一样不可避免地有略微的讹漏。

20 世纪婴儿死亡率及预期寿命的变化过程中，不平等程度下降了。20 世纪开始时——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数据的匮乏和不可靠有时使十年为单位的比较成为必须，总共九个国家在死亡率上的全球差异与作为西欧代表的法国相比为 0.597，1950 年是 0.305，1990 年是 0.180。标准差从 55.5 到 21.9 再到

① 对于主要的通向现代性的历史道路的进一步讨论见 Therborn, 1995: ch. 1.

② 对于这里涉及的相关基本机制的讨论，见 Tilly(1998)对于绝对剥削的讨论，见 Patterson(1998)论及奴隶制种植园的持续性影响。

相对运动被限制了,而且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中,历史背景对婴儿的相关命运有重要意义。南部欧洲(以西班牙为代表)和日本已经赶到了首位,美国失去了领先地位,墨西哥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成功,虽然应该注意表中埃及的数字是从1920年代开始的,而且很可能1900年的数字更高些,墨西哥与印度之间在世纪初的大幅差距是不确定的,虽然其他时间序列上的数字显示墨西哥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总死亡率高于印度的同期数据。二战后的绝对下降恰恰是由于历史的原因。1950年的数据正确预示了1999年数据的90%。

当然,历史的重要性对于全球收入的发展也同样真实的。在这些方面可敬的经济史家比人口统计学家做出了更多的估计。

今天,全球历史与我们息息相关。21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与1820年相同,北美盎格鲁地区和西北欧领先,随后是南欧。日本是唯一在20世纪下半期加入富人俱乐部^①的新面孔。19世纪见证了包括阿根廷在内的作为欧洲殖民地的新大陆的壮观崛起,以及与欧洲在其海外分流后跳升的同时,甚至更为惊人的亚洲的停滞。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是整个亚洲相对衰退的一部分,虽然其程度小于中国和印度。20世纪晚期另外一些东亚成功故事也维持了它们自身自1900年以来略好于在过去两个经典世纪中南亚和东亚文明境地的情况。印度—克里奥尔和非洲—克里奥尔拉丁美洲也在19世纪中失落了。在安吉斯·马迪逊英雄般的成就中我们看到1900年前的非洲还发起过挑战,但是到了1900年就不值一提了,并且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显著地相对贫困化。上述的编年史对待俄国共产主义不够公正。尽管是那场毁灭性战争的牺牲者,但仍有某种程度的赶超。在1913年俄国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28%,在1973年这个数字是36%。

事实上,国家运动在20世纪是可能的。英国和阿根廷显著地衰落了,撒哈拉以南非洲、芬兰和韩国像日本一样崛起了。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反弹。目前东亚的再次崛起解释了在1950年和1999年的GDP数据间相关性最弱这一事实。但从总体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由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决定的全球收入型态中。1820年的数据正确地预示了1999年情况的67%,而通过1900年的数据我们可以估计到一个世纪后情况的72%。一个西欧和欧洲新大陆殖民地在其顶端的型态。非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地区在其底端,反现代化的非殖民地国家以及殖民地与殖民主义的混和体如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处于中间位置,但是东亚反现代化地区在20世纪后期具有显著优势。离散度增加了,标准差从1900年的25.8增加到了1999年的29.3。

3. 流动的力量

当然,历史并不是由其自身再生产出来的。在全球分配中各国的历史地位被超国家的流动、卷入以及国家进程再生产出来。无论其根源是什么,有几种方式可以使最初的优势得以维持和随时间流逝而累积。一旦一个经济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已经“起飞”,它就可以维持一个高比率的储蓄和投资。健康、营养充足并且得到良好教育的父母倾向于产生同样的后代。一个好的经济景况比糟糕的经济景

表5 有选择的部分国家1900—1999年的相对婴儿死亡率
相对比率,以法国数据为基准,每年为0

	1900	1950	1999
法国	(162=)0	(52=)0	(6=)0
西班牙	52	12	1
俄罗斯	90	29	12
美国	-19	-13	1
阿根廷	22(a)	16	16
墨西哥	180(b)	44	25
埃及	53(c)	78	45
印度	83(d)	85	66
日本	64(a)	8	-2
斯里兰卡	32(e)	30	12

注: a. 1920—1925年数据与法国1920—1925年数据相比较; b. 1900年代数据与法国同期数据相比较; c. 1920年代数据与法国1920年代数据相比较; d. 1910年代数据与法国同期数据相比较; e. 1901—1905年数据与法国1901—1905年数据相比较;
相关系数: 1900—1950, 0.52; 1900—1999, 0.39; 1950—1999, 0.95
资料来源: Chesnais, (1992表A4.2—5; UN(2000a))

① 没有考虑到一些很小的阿拉伯石油国家,如科威特和卡塔尔以及作为贸易中心的城市国家如新加坡。

况更可能产生和维持政治的稳定,而政治的稳定反过来比社会动荡更可能增殖投资和生

经济地理学家早已注意到在一国内没有任何明显自然优势的特定地域中专业化经济高度集中的现象,并始终被这个问题困扰。在 20 世纪晚期,这一思想被一些国际经济学家提出、发挥和具体阐释,并按照经济学家的时尚,将其经济极化的动态进程模型化(Krugman, 1993; Krugman & Venables, 1995)。规模报酬递增、运输的成本,以及对特定资源依赖的减少已经以这种方式说明了优势在一极的产生和劣势在另一极的出现,即说明了排斥机制的运行。克鲁格曼关于核心—外围的区分可以被认为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早期思想的一个详细说明,并对现代世界体系中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对立略微给予突出。^②世界历史的成功部分由好与坏的螺旋型因果关系组成。

古典经济流动是贸易、资本运动和移民。通过更复杂的贸易模型和近来对这三种流动的同步关注,这些流动对分配的复杂而模糊的影响逐渐被认识。它也成了活跃的论争对象。

在现实世界中,国际贸易尚未达成一致,其排斥性影响由自由派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如威克塞尔、赫克歇尔和俄林,加以理论化并可在北大西洋地区被观察到。而当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性经济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自大萧条到 1980 年代早期趋于一致(如在 GDP 上)时,出口取向的东亚国家经济从 1960 年到 1989 年实际上却一直处于分化状态(Rodriguez & Rodrik, 2000: 52)。开放对国际贸易与竞争的短期影响

一直被激烈争论,被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有力地推动着的贸易全球化亦然。在 2000 年 10 月斯德哥尔摩发生的这一回合争论中,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2000)卓有成效地推翻了大卫·道勒和阿特·克莱(David Dollar & Art Kraay, 2000)的断言:1980 年代“全球化中”的经济拥有的高增长率是由于它们的开放。但另一方面,无需争论的是他们无法找到在国际贸易的规模与国内不平等之间的显著对应关系,这意味着对于一些例子如东南亚,开放只有轻微的甚至没有极化效果,而另外一些国家,如晚些时候的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则是另一种情况(摘自 Wood, 1997; World Bank, 2000a: 70—71)。

在富裕国家中世界贸易的潮流不可阻挡。西方七国集团占了世界贸易的一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几乎占到 3/4。东亚和东南亚的出口增长没有什么影响,二者 2000 年所占的贸易份额和 1982 年的数字基本相同。(即使不考虑 OECD 最近的扩展,它也占有世界贸易量的 2/3)(OECD, 2000, Annex 表 47)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有适度增长,从占 OECD 成员国 GDP 的 1962 年的 1.6% 上升到了 1982 年的 2.4%,到了 1999 年则上升到了 3.4%。但是富裕国家进口品的组成部分与古典时期相比有了根本的变化。1998 年高收入的 OECD 成员国从中低收入国家进口的物品中,制造业产品占到了 2/3,在美国则占到了 3/4(World Bank, 2000b: 表 6.3)。

表 6 世界 1820—1999 年相对人均 GDP 比率

指标:以美国每年为 100

	1820	1900	1950	1999
西欧(a)	95	71	58	76
法国	95	70	55	72
西班牙	83	50	25	55
俄罗斯	58	30	30	21
土耳其	...	18(b)	14	20
拉丁美洲(c)	...	32	36	23
阿根廷	...	67	52	37
巴西	52	17	17	21
墨西哥	59	28	22	25
中国	40	16	6	11
印度	41	15	6	7
印度尼西亚	48	18	9	8
日本	55	28	20	79
韩国	...	21	9	48
泰国	...	20	9	18
埃及	...	12	5	11
加纳	...	11	12	6
尼日利亚	13	2

注: a.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英国的算术平均值,也就是 20 世纪中期经济的“西欧”的定义; b. 1913, 与美国 1913 年数据比较; c.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算术平均值。

相关系数: 1820—1990: 0.96; 1820—1950: 0.89; 1820—1999: 0.85; 1900—1950: 0.96; 1900—1999: 0.82; 1950—1999: 0.77

资料来源: 计算结果来源于, 1820—1950: Maddison(1995: 表 1—3^①); 1999: 世界银行(2000a: 表 1)

① 参考文献中没有 Maddison 1995 年的文献, 暂存疑。——编者

② 有人可能会认为, 同样的进程隐藏在对科学和学术的关注下并导向少数的精英制度。

这种新的贸易型态为对全球薪金竞争的分配效应的讨论提供了论据(Wood, 1994)。隆·琼斯向我们展示了甚至貌似合理的贸易模型对它们影响的估计也是模棱两可的。关于这个争论的最近的结果似乎是通过富裕的 OECD 国家进行比较,它们在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中存在一个显著的统计上的不平等效应,但如果仅考察西欧的话这种效应就消失了。这就是说在发达的福利国家中并不存在这种效应(Gustafsson & Johansson, 1999)。

成功的出口对国内分配的效应在不发达国家看上去也是变化的。虽然他对于数据的公平而宽泛的看法看起来是非结论性的,但阿德里安·伍德(Wood, 1994, chs. 6. 2—6. 4)倾向于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可以验证他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具有平等主义效果的假说。另一方面,鲍诺奇·罗(Bhanoji Rao, 1999)转向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收入和收益的不同来源进行分析,提供了对持久稳定的国家的、地区内的变化的卓越描述,其中还包括从 6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后期随时间变化的某些国家趋势。^①在另一些不发达的中等收入国家,如墨西哥和土耳其,贸易开放实际促进了收入分化和收益的不平等(World Bank, 2000a: 71)。一份关于这个论题的全球分析还刚刚开始。

在一项对大西洋地区经济的大规模历史研究中,凯文·奥鲁克与杰弗瑞·威廉姆森(K. O'Rourke & J. Williamson, 1999)对货物、资本和人力的流动一起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主要依赖的变量是 1870—1910 年的实际报酬,他们的主要发现是灵活性因素对大幅度集中的解释。最重要的是欧洲往新大陆的大规模移民降低了大西洋两岸的报酬差距。资本向斯堪的纳维亚的流动也是重要的。贸易相对而言只有较小的效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没有什么影响。

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正在形成,它将把贸易以及劳动与资本的灵活性引入当前全球流动的分析中。这些流动新近彻底改变了它们的方向,原有的方向是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对 19 世纪前半期的世界经济图景的重复。

19 世纪晚期的全球化浪潮首先创造了在新兴富裕经济间相互有利的流动。欧洲将它的大部分人口——约 6000 万——输出到了人口少,土地和资源丰富但资本匮乏的海外殖民地。虽然在这一时期也有其他移民潮,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向东南亚的扩散,但是欧洲向美洲的移民远比这些重要。世界领先的投资者——英国的资本也主要向这同一方向流动,而法国和德国的资本首先流向了东欧。主要的贸易型态是工业性的农业和采矿业,工业欧洲出口制成品,并从新大陆和东欧进口食品和工业原材料,帝国殖民地及其内部流动在这个型态中是边缘性的(摘自 Hobsbawm, 1987: 73—74)。

一战成功地造就了 20 年的反全球化,贸易、移民和资本的灵活性全部降低了,二战的效果也是如此。二战后对全球经济的逐步重建发生在一些新形势下:苏联作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崛起,领导着社会主义阵营,日本完全进入了发达国家经济圈,西欧处于风口浪尖,以及世界范围的去殖民化。然而基本上 1914 年以前的西欧和欧洲新大陆殖民地经济的连结即资本(现在主要是从美国流向西欧)、人口和贸易的流动,在一个相对低的整合程度上被重新建立。

这种流动型态的第一个主要变化是,从 1960 年代早期开始,欧洲从一个向外移民的大陆转变为一个流入移民的大陆。土耳其、北非和南亚(向英国)是主要的移民提供者,在 1990 年代则是东欧。在 1980 年代,向美国的移民重新开始,但这次不再是从欧洲输出。拉丁美洲从移民的目的地变为了移民的来源。种族歧视在北美被抛弃,稍后,在 1970 年代,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向重要的亚洲移民开放。简而言之,经典的北大西洋移民流被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流所代替,虽然比例较前者为小。这种新的移民型态将对全球平等化产生影响,新的向波斯湾中心地区的移民以及南部非洲、东南亚和西非的地区移民输出体系也是如此,即使其规模较小。到现在为止,有关这些效应的成体系的的知识还很少。涉及数字有时是真实的。在 1990 年代,8%的墨西哥出生人口居住在美国,大约 10%的菲律宾人在国外

^① 台湾的情况,现在部分地可以与卢森堡的收入调查结果相比。它的数据显示其不平等程度在 1981 年到 1995 年间只有轻微的增加。基尼系数从 26.7 上升到 27.7,这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处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欧国家间的数字,或者换一种说法,非常接近撒切尔夫人上台前英国的情况。(LIS 国际数据库)

生活。在加勒比海上的小国中,10%—15%的人口是外来散居者(Binational Study on Migration, 1998; Castles, 2000;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Migration, 2000)。

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资本流动仍然是压倒性的,从占有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 $\frac{3}{5}$ 上升到了 $\frac{2}{3}$ 。但是在20世纪最后十年外国直接投资的飙升也许是一个对原有形态修正的开始,一个更真实的部分流向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作为外资的吸引者出现,在1990年吸收了全球流入资本的1.8%,在1998年这个数字是7%。拉丁美洲重新成为了外资的吸引者,在世界资本流动中占据的份额从4.2%上升到了11%(World Bank, 2000a: 21; UNCTAD, 1999; 图2和表6)。在什么程度上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停止了这一趋势尚有待观察,但是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危机的阴云在1999年仍未消散,东亚和东南亚分享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旺盛增长降低到了世界总量的11%(4%流向中国),拉丁美洲的情况也从1996年的占全球近 $\frac{1}{4}$ (23%),降低到接近这个数字。在绝对量上,1999年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净流量是1985—1995年平均量的5倍,从大约300亿美元增加到1500亿美元。在另一种量上,外国直接投资从占这些国家总固定资本构成的5%上升到11%(UNCTAD, 2000)。

虽然资本流向的局部变化可能对资本流入国产生短期的内部极化效应,但是它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望减少世界不平等的程度。

另一方面,短期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遍地开花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推动下,引起了新的金融不稳定,继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通常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增加。东亚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1000万人堕入极端贫困(World Bank, 2000; 23; 进一步讨论见 Comia, 2001; 32ff)。墨西哥1994—1995年和1980年代早期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类似。拉丁美洲在1980年代、非洲在1980和1990年代发生的由于巨额外债——以及要支付的利息——所导致的危机,对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有显著影响。

对跨国界知识的流动研究就少得多,虽然约翰·迈耶尔(John Meyer, 2000)及其合作者团体已经研究了组织和制度观念的扩散,如向全球性联系起来的社会中的行动者提供社会的“范本”。这种教育、教育体系和课程的传播已经通过这个角度被观察(Meyer et al., 1992)。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大众文化水平在20世纪后半期的提高就是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并且对人类能力的更平等分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理所当然的是,在大量实际情况中如在共产主义中国和独立的前殖民地,这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

更特殊的是医学知识的全球流动,它已经开始,但仍然需要面对大量由于所有权和研究资源不平衡而产生的障碍。然而,主要是医学知识流动对死亡风险和预期寿命产生的作用使其较之收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更平均的分配。喷雾(如消灭疟蚊)、疫苗、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治疗,以及卫生设施与卫生学在控制传染病中的作用,这些知识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对死亡率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

一个关键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有力的例子是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它战后的消灭疟疾运动十分重要。而且这样的例子不只一个。1945年,其自然死亡率为21.5(‰),与1939年几乎一样。到了1947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降到了14。1950年是12.4而在1950年代后期则低于了10。印度的情况也如此,1930—1945年,在21与25之间震荡,1949—1950年,降到16。香港在1939年的死亡率是30,到1946年则为11(Chesnais, 1992; 表A3.11)。同样的变化发生在东亚。非洲则缺乏可靠的人口统计历史数据。看起来最可靠的数据是突尼斯和埃及的,死亡率从二战期间的27—28降低到了1960年代的18—19(Allman, 1978; 12; World Bank, 1978; 表15)。^①在东非20世纪的死亡率统计始于50年代,肯尼亚1962年的数字相当低。比属刚果在1955—1957年的数字大概是26,象牙海岸则为29。但西非和中非的死亡率在独立前夕趋向于超过30%(Coale & Lorimer, 1968; 表4.2; World Bank, 1978; 表15)。

部分加勒比海国家,如古巴和牙买加,死亡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开始下降,但统计报告显示的精确数据不足为信。例如古巴在1930年的死亡率低于除荷兰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

^① 沙奈(Chesnais, 1992: 568)给出的埃及的数字在整个1950年代都低于20,而突尼斯的数字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在1952—1954年仅为8,在1960年达到了10。

(Chesnais, 1992: 表 A3.4 和 A3.9)。也许更具代表性的是墨西哥的情况, 在二战期间死亡率在 22 左右, 而到了 1950—1953 年降低到了 15—16。

总之, 在产生最为重要的世界平等化进程方面, 医学知识的传播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果不是独角戏的话。(避孕用具的传播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的例子, 对世界人均生活机会的分配也有重要意义。或者是在 1960 年代绿色革命中出现的高产农作物, 这对南亚比其他地区更为重要)1900 年新生儿预期寿命在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是 24 年, 这意味着法国人的寿命是印度人的两倍。上世纪中期医学知识有效地传播到亚洲前, 这差距继续扩大, 大约是 34 年。到了 20 世纪末, 已经减少到了 15—16 年 (Mari Bhat, 1989: 92; World Bank, 2000: 表 2)。从 1960 年到 1997 年, 预期寿命在所有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中从 46 岁上升到了 62 岁, 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从 24 年减少到了 12 年。预期寿命成为了少数发生在独立非洲的长期成功事例之一。1960 年到 1998 年间,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预期寿命从 40 岁上升到了 50 岁。但是与富裕国家间 28 年的差距仍未缩小 (UNDP, 1999)。

对于世界人口总体而言, 新生儿预期寿命在 1962 年到 1997 年间从 55 岁上升到了 66.6 岁。以基尼系数——一种通常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标准, 范围在最平等国家的 0.2 到最不平等国家 0.6 之间——来衡量世界不同国家间预期寿命的不平等程度, 这一数字从 0.24 下降到了 0.11。^① 从平等主义观点出发, 这种生命的平等化是惊人的, 并且是全球发展的重要积极信号。应该考虑到 1990 年代的反向转变, 在共产主义之后的东欧特别是前苏联地区和巴尔干地区, 在饱受艾滋病侵袭的非洲特别是它的南部。男性俄罗斯人的新生预期寿命在 1991 年到 1994 年间从 64 岁减少到了 58 岁, 在 1997 年重新上升到了 61 岁 (Cornia & Paniciá, 2000: 6; McKee, 2001: 28)。迄今为止, 这些最新的发展并未停止, 只是减缓了, 全球预期寿命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

非洲在上一个十年中的经历也许预示着在知识流动方面的一个更糟糕的转变。虽然传统经济流动可能变得倾向于减少不平等, 但知识的流动效果可能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正被一种新的而且依然神秘的疾病的传播所显示, 艾滋病的传播已经严重打击了南部和东南部非洲。虽然有切实的国际援助努力与其斗争, 但仍然没有非洲病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药物出现。艾滋病毒在一些非洲国家造成了悲惨的后果。在过去的十年中, 新生儿预期寿命在博茨瓦纳减少了 21 (!) 年, 在肯尼亚减少了 8 年, 在莫桑比克减少了 2 年, 在坦桑尼亚减少了 5 年, 在赞比亚减少了 10 年, 在津巴布韦减少了 12 年 (World Bank, 1990: 表 1; World Bank, 2000a: 表 2)。这意味着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一个整体, 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再次被拉大, 从 1980 年代晚期的 25 年扩大到了 1990 年代的 28 年。

艾滋病问题使制药工业的权力和定价问题引人注目, 更一般的问题是美国税务国际协议在关于知识产权的贸易相关方面的“错误”。发达国家的大制药公司正在努力避免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公司——例如印度、南非和巴西——来向 HIV 的感染者提供可负担的有效药物。南非和巴西在 2001 年上半年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错误和专利权仍然是药物和农业知识流动的关键问题。

科学知识的生产中心在世界的富裕地区, 特别是美国。1946 年到 2000 年间在科学和经济学方面获得诺贝尔奖的 371 位人士中, 218 名 (59%) 是在美国的机构中工作, 139 名 (37%) 是在西欧的机构中工作。美国的优势近些年来在上升。在 1994 到 2000 年间获奖的 61 人中有 45 人来自美国, 13 人来自西欧 (另外三人是一名加拿大的物理学家, 一名俄罗斯的物理学家和一名日本的化学家)。这些中心也为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学生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教育, 这有利于后者, 在被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学者回国的情况下。有多少人回国了, 有多少最优秀的人被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机构与企业选中留下了, 对于这一点我们只有支离破碎的了解。但是穷国严重智力外流的风险在最近的世界移民报告中被提了出来, 报告指出大约 23000 名学术人才正离开非洲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Migration, 2000)。

在制度化机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债权人力量卷入——以及美国政府支持

^① 计算见 Melchior et al. (2000: 79), 他们的数据来源是 1999 年版的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说明来解释近来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在吉奥瓦尼·安德烈·柯尼亚(G. A. Cornia, 2001: 36—37)的文章中,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采纳的政策改革表现出显著的反平等化效应,而这是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华盛顿多数意见”所推动的。

4. 全球卷入的力量

二战后民族国家的激增伴随着形式上的国家统治日益卷入错综复杂的国际网络变化中。一些是地区性的制度,如欧盟;一些是非正式的地区性联系,如地区危机的蔓延,1997—1998年东南亚的危机是最近的主要例子。一些是特定的,如富国俱乐部OECD,另一些是全球性的,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构成了全球性卷入,如冷战时的超级大国阵营,或重要的和资源丰富的全球国家间的运营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以及相似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PPF)。

国家统治的相互联系和外在于国家的依赖导致了卷入。作为一条规则,如果不是复杂的原理的话,依赖是非常不均衡的,但是它将会是一个道德—政治的和分析性的错误,如果忘记了国家政府和它的责任的话,即使与强大的外在力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关时也是如此。甚至外债在决定借贷和使用方式或浪费方式上也是源于国家的。

全球卷入和全球网络规范着贸易、资本和人口的流动,通过超国家的公司,并且,比如,沿着前殖民地的线路(摘自Kritz et al., 1992)。全球流动的固定化、“全球性城市”的地方联系、散居者的共同体或移民聚居区都产生连带地方性的全球性卷入,产生地方不平等进程。但是这里我要指出另一些特殊机制,有三个看起来尤为重要。

全球性(或国际性)的国家议程框架是其中之一。一项全球性资源的标准朝向对国家情况的审视性关注,并且将此带入国家议程中,通过它的特殊渠道进入国家政策制定进程。经济合作组织(OECD)已经用这个程序来推进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公共服务的竞争性管理和降低税率。联合国全球机构通过对其促进性和平等主义目标的发扬,制定关于如水与卫生设施、疫苗、营养、女童教育和逐步减少贫困的分配目标。这些努力经常失败,但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尝试常常涉及超国家的资源配置和对民族国家的压力。连带制定目标的关注通常旨在减少不平等分配,虽然在大体上当然可能向一切其他这类机制一样,以另一种方式实施。

制度模式化是第二种机制。设计和规定一定特殊性的国家制度。在最近一段时期,全球模式化采用两种主要形式,并有一种与分配取向相反的趋势。旨在推动世界的自由化、摆脱规则、私有化和边界开放。拆除对企业和市场的壁垒是其主要目标(对其影响的一系列批判性考察见Cornia, 199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以及在他们背后的美国政府(摘自Wade, 2000)是主要的驱动力。

另一种变量产生于联合国组织,关注的是拆除针对个人的障碍,消除社会排斥和减少等级制。一般而言是人权运动,更专门的是帮助弱势和受歧视群体如妇女、儿童、少数种族和移民工人对抗强势的社会范畴。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公约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手段。最近的性别平等和赋予贫困者权利也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银行的议程(World Bank, 2000a: Part III)。

第三种是具体的政策规定。从一个大的范围来说它已经在1980年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非洲和拉丁美洲所制定的“政策结构调整”中被发展和实行了。它又进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1997—1998年发生的从泰国到韩国的东亚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中。但是有比这更为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政策规定。最重要的是控制出生率政策,从1960年代早期开始由世界银行、美国、欧洲新教政府和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在国际上推行。在布加勒斯特1974年和墨西哥1984年两届人口大会之间的十年内,这项政策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接受。

议程框架、制度模式化和政策规定通过切实有力的形式得到了运作:通过被邀请或强加的顾问,通过经济激励和援助,以及通过对信用优先取舍权的认可、成员资格限定和公开批评。其净分配影响难以估计。联合国目标制定和人口政策显然具有平等化效应,即使这些目标时常无法达到。妇女是这种全

全球化中的胜利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的直接影响,包括最新一次在亚洲的影响,通常是递减的(Cornia, 2001),而它们的中期增长效应是难以确定的甚至是负面的(Przeworski & Vreeland, 2000; Easterly, 2001)。近来有力量的国际组织增加了对分配的关注,但是最近世界银行两位关注这方面最突出的人士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和拉维·坎博的辞职,揭示了其界限。

直接的官方援助已经有了实质举动,至少对几个穷国的短期效果是如此。在1990年总计占撒哈拉以南非洲GNP的10%。到了1998年已经降到了4%,而对全世界的低收入国家而言,外国援助仅占它们国家收入的1%。然而,对个别几个国家而言,这个数字仍然是有重要价值的:1998年尼加拉瓜和莫桑比克GNP的28%,马拉维的1/4,厄立特里亚和蒙古的1/5,坦桑尼亚的1/8,海地和塞内加尔的1/10(World Bank, 2000a;表21)。

5. 国家的反弹和分歧

如上所述,不平等的机制根本不需要是全球性的,虽然我们可以将其影响看作一种全球效果,看作不平等的世界型态。这与国家机制、国家资源因素和对它们的利用和发展、国家制度、国家力量关系以及国家决策和战略有关。这里没有全球性因果联系,虽然结果也是一种全球性分配,通过也是一套国家分配型态的疏离机制。在迄今为止的国家间互动中,另一些国家构成了一个舞台,以机会结构的形式,每个行动的国家可以用各种机遇和技能为其自身谋利。这些国家机制从通常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和讨论中得到了某些暗示,并形成了解释世界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家庭调查基础上对全球个人不平等的初步研究中,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 Milanovic, 1999)得出结论,通过对泰勒指数的分解,认为75%的世界不平等(在个人间)取决于他们生活在什么国家,并且通过对基尼系数的分解,认为88%的世界不平等是个人之间的。事实上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这个数字是一个重要的夸大,因为许多大国——如中国、印度、印尼、孟加拉国、埃及——已经预先划分成了城市与乡村,出于其他目的这也许是富有成效的。

在世界最不平等的港口国家社会里,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几乎与全世界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相同。米拉诺维奇(1999)计算的1993年世界不平等基尼系数为0.66。在巴西,1998年,相应的数值是0.60(Paes de Barros et al., 2000)。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南非以及一些小国家如中非共和国、危地马拉、巴拿马和巴拉圭有着相同的分配,它们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几乎与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相同(World Bank, 2000a;表5;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8: 16)。

当然,一方面在世界流动之间存在许多接触面,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进程。让我们举出几例。全球流动可能与之互动并影响到:

国家经济的运转和它的分配机制;

国家促进或反对不平等行动的能力;

国家行动者的渴望和选择的特权。

全球分配机制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影响可以通过影响国家制度的再分配来发挥。虽然这是一种严肃的可能性,但是它已经倾向从在脆弱基础上的争论向一种放大的被建立的事实转变。

考虑到那些对再分配严重关注的国家,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瓦解后主要是那些西欧福利国家,有充足的理由不把这种国家再分配能力的下降看作是经济开放的普遍和必然的结果。另一个是事实上的显著的正相关,在向世界市场的经济开放与一般政府开支或公共社会开支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之间。前者在1980年代世界中可被看到,后者则是1990年代的OECD(ILO, 1997: 78—79)。在老的OECD国家中,1990—1997年在GDP出口规模与社会迁移之间的相关度是0.26,然而它与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之间是负相关, $r = -0.34$ (在可支配收入方面的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至少对OECD国家而言,原因是从一些国内平等主义和国际贸易资产的幸运复合中产生的积极加速起点。后者的成功在于使不同阶级间的互利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工人对生产力做出承诺,雇主接受税收和高薪。

另一个没有非常有力证据的没有压倒民族国家的原因是,在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之前,OECD国家

有一个很高的增长,这可以通过公共开支的份额增长来衡量。

无论对公共开支还是对公共收入的衡量,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公共部门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对西欧的 OECD 国家、北美、日本和大洋洲而言,政府总费用的国家平均值在 1960 年占 GDP 的 25%,在上世纪末的 1999 年,公共支出已经增长到了 47%。对西方七国而言,公共费用从占他们总 GDP 的 28% 上升到了 37%。事实上,两种情形的支出份额,在 1990 年代早期的不景气年份中高于十年繁荣期结束时几个百分点,但是这应该被阐述为主要是一种共振。根据政府收入,20 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带来收入最多的十年。对 OECD 总体,这意味着 GDP 的 37% 流入了公众的保险箱,对欧盟而言则是 44/45% (OECD, 1999; 表 6.5 和 6.6; OECD, 2000; 附表 28)。

对 OECD 总体和欧盟 15 国而言,20 世纪的最后 40 年,政府的扩张快于对外贸易,这样一种关系在全球化话语中通常被忽略。1990 年代对外贸易依赖的较快速增长,尚未超过自 1960 或 1974 年以来 OECD 与欧盟国家的更高的积累增长。事实上日本在 1960 至 1973 年期间比在 1990 年代更为依赖于出口。

从历史上讲,现有最发达国家的政府配置有更好的金融、行政能力和政策专家资源。^①事实上,全球金融市场新的变动性意味着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的一般增长,对个人投资者和政府都是如此。然而,如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其他近期的危机所表现出的那样,公众在处理这类危机上的能力比 1929—1931 年有了很大的提高。

国家政策、制度和国家分配标准在分配上的重要性已经在最近得到了英国专家安东尼·阿特金森 (A. Atkinson, 1999a, 1999b) 具有说服力的强调。他的最生动的例子是美国和加拿大从 1977 年到 1998 年 20 多年来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两条对比的轨迹。美国的分配在 1980 年代是相当不平等的,特别是前半期,在 1990 年代则是更高但是无倾向性的不平等;但其加拿大邻居则保持了一个基本稳固的更平等的分配,虽然有小的摆动。后者在 1980 年代则倾向于一定的下降(更平等) (Atkinson, 1999a: 4)。

如果我们关注贫弱的国家即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话,自然这幅图景就不同了。跨国的危机和强加的“结构调整”政策有一个很强的负面分配效应。但是证据是这些危机、随后导向的外在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卷入和随后造成的更多不平等的危机政策而不是实质上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增加(摘自 Atkinson, 1999a; section 3.3)。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古巴的幸存,独具特色的伊朗革命和马来西亚在最近的东南亚危机中的成功自主都是相对贫穷国家地区持续反弹的例子。

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对全球经济分配具有相当可观的影响。从 1991 到 1999 年,非洲人均 GDP (以购买力衡量)降低了 6%。如果这个大洲拥有南亚的人口统计记录,而保持它自身适度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将上升 2%。如果中国的人口政策和非洲的经济增长率结合起来,人均收入将上升 9% (计算源于 UN, 2000a; 表 A1)。

四、结 论

与全球化和全球进程一样,不平等是多重的。它们也有不同的轨迹。直到最近,在非洲艾滋病肆虐和东欧后共产主义的创伤的情况下,最基本的人类生存能力在 20 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等化进步。全球的生命不平等减少了。

^① 在对 1969—1973 年和 1986—1990 年从不发达国家进口制造业产品对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影响的模型化中,阿德里安·伍德 (Wood, 1994: 314ff) 得出了相当良好的吻合 ($R^2=0.60$), 在一个互动模型中,进口增加对失业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工资的完全弹性或有力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消除。

表 7 1960—1998 年政府增长与外贸增长

政府总支出和出口在 GDP 中所占比例。

1960—1999 年的增长,百分数从 1960 年开始

	支出		出口	
	OECD	EU15	OECD	EU15
1974	6.5	8.4	4.7	6.6
1987	12.9	16.7	4.7	7.2
1999	13.1	18.5	10.6	14.0

资料来源: OECD (1999, 表 6.5 和 6.12); OECD (2000)

总体上说, 在世界中存在的不断增长是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 伴随着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大西洋社会达尔文主义, 尽管奴隶贸易被禁止了, 后来奴隶制也被废除了。纳粹的失败经历推动了在 20 世纪后半期向存在的平等的进步, 美国最高法院、去殖民化和殖民后的联合国组织又对此有进一步的支持。

另一方面, 用国家间人均 GNP 来衡量的经济不平等在过去的 200 年中几乎持续增长。虽然以购买力(PPS)衡量, 国家间非平等化进程在 20 世纪的最后 30 年停止了, 但还是稍微倾向于较低水平的不平等。而国家则相反, 在北大西洋地区自大萧条到 1950 年来存在着—股平等化浪潮, 而另一浪潮则发生在 1960 年代直到 1975—1980 年间, 随后, 朝着更加不平等的方向产生了一种全国性的不均衡和非普遍性的倾向。

这个世界的的不平等由许多不同的进程产生。我们已经区分出四种基本的不平等机制: 疏离、排斥、威压/服从和剥削。进一步, 我们试图分开全球和次全球或国家力量, 在平等和不平等的方向上详细阐明全球历史的意义和全球货物、服务、资本人力、信息和思想流动的力量。第三点我们讨论的是国家平等和不平等机制及其与全球流动的接触面, 以及最后是对全球国家、全球制度和组织的卷入的讨论。

从这些复杂解释中得出的结论只是非常初步的。到现在为止这种因果模型只是口头的, 一种用社会复杂性来加重的学生负担, 如同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常做的那样。但是一些大致相关的权衡似乎是可能的。这样, 并附着必要的说明, 似乎全球历史和当前国家进程是当下不平等的全球结果的最有力的制造者。这些世界中的不平等既是国家的, 也是全球的。最近的全球流动, 只有一两种是在主流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引人注目的位置, 显然次于历史形成和国家制度和进程的重要性, 即使信息和思想的流动在传统的讨论中被严重低估。

令人吃惊的是一些国家社会, 即使是像危地马拉或巴拿马这样的小国, 在像巴西这样的大国旁边, 这些海港几乎有与全世界相同的不平等程度。(这也是真实的, 即富国和穷国的国籍, 换句话说就是国家间的不平等说明了全球不平等的大小)国籍是全球不平等的重要制度。

从 16 世纪起西欧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剥削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段历史到底对当前世界的的不平等有多大意义仍不清晰并备受争议。尽管如此, 这似乎仍是一份长期的遗产。帝国主义剥削后来产生了后帝国的、国家的不平等机制。掠夺留下了长期烙印, 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定位。

超领土流动的力量与包容的方式一样可以导致不均匀的排斥。发展得最完善的关于流动的国际贸易理论, 正在从 19 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包容性的推断产生的所谓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转向一种不可知论的不确定性论调。而贸易的地理学理论提供了排斥动力学的正式模型。从历史上看, 跨国移民是包容性平等主义的主要机制, 但是对今日, 何以一般移民率较低——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 而高技术移民率较高, 我们似乎仍然了解不足。

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流动倾向于产生一个包容的、赋予权利的影响。间接地, 行动者的渴望已经向更加平等、破坏地方和传统的顺从以及坚持自我的方向变化。更直接的是, 医学和卫生学知识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从 1900 年左右开始, 在 1945 年加速, 已经非常重要地对减少世界生命不平等产生了实质性的作用。新农业知识的绿色革命也对减少不发达国家乡村和东南亚的贫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在信息的流动正受到专利权的威胁。

可是思想可以有很多种, 并得到了相当有说服力和经验性的讨论(Cornia, 2000),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多数意见”已经在一个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里显著地产生了向世界更加不平等转变的作用, 通过其一般的意识形态也通过国际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力量, 还通过与弱小民族国家的牵连。

但是上面的分析也发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民族国家的反弹, 即使是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面对着巨大的南方邻国并处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的强化的框架内, 加拿大坚持独立、清楚的更加平等主义的道路, 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 在 1990 年代芬兰设法保持着世界上最平等

主义的可支配收入分配, 而不顾伴随着突然而至的两位数失业率的严重萧条(Atkinson, 1999b: 20)。芬兰的情况没有因为这一事实变得更糟: 就在这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十年内产生了世界移动电话的领先生产商诺基亚(Nokia), 虽然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不平等。

20 世纪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性的世纪: 在 19 世纪开始上升, 从帝国王朝末期起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二战后巨大的去殖民化浪潮中激增, 并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破灭中进一步增加了它的力量, 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而得到加强, 主要在西欧, 但在某种程度上席卷所有富裕国家。现在, 正在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尚未结束民族国家的时代, 与许多怀旧和必胜的断言相反。新的世纪也许会目睹民族国家被削弱, 但是现在尚未发生, 除了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第三世界的涉入对象在现时期总是羸弱、贫困和对外依赖的。

不平等是重要的, 严肃地对待它意味着认识它不是简单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论题, 对它进行学术探求就必须充分进入全球世界彻底的复杂性中, 这是一个像现在已被制造出的世界一样的被历史地塑造出的世界。

(覃方明 王 楠译)

参考文献:

- Allman, J. 1978,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idem (ed.), *Women's Status and Fertility in the Muslim World*, New York: Praeger.
- Atkinson, A. 1999a,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UK and OECD Countries in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5: 4.
- 1999b, "Is Rising Inequality Inevitable? A Critique of the Transatlantic Consensus." *WIDER Annual Lectures*, 3, Helsinki: UN University.
- Binational Study on Migration 1998, *Migration between Mexico &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 Bourdieu, P. 1979, *La Distinction*, Paris: Minuit.
- Bourguignon, F. & Morrisson, C. 1992, *Adjustment and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New Approach*, Paris: OECD.
- Castles, S. & Miller, M. 1998, *The Age of Migr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2nd ed.
- Castles, S. 2000, "Migration as a Factor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sia." Paper for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4—6 May.
- CEPAL(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ECLAC) 1998, *Panorama Social*,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 Chesnais J.-C. 1992,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oale, A. & Lonimer, F. 1968, "Summary of Estimates of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In W. Brass et al., *The Demography of Tropical Af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rnia, G. A. 1999, "Libe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WIDER Working Papers*, 15, Helsinki: UN University.
- 2001, "Trend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ost War Period: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UNU/WIDER Helsinki.
- Cornia, G. A. & Paniccià (eds.) 2000, *The Mortality Crisi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Oxford: OUP.
- Dollar, D. & Kraay, A. 2000, "Trade, Growth, and Pover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Stockholm October 20—21.
- ECLAC (CEPAL) 1997,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Santiago de Chile, ECLAC.
- Easterly, W. 2001, "The Effect of IMF and World Bank Programs on Poverty." UNU/WIDER Helsinki.
- Fischer, C. et al. 1996, *Inequality by Design, Cracking the Bell Curve My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ustafsson, B., & Johansson, M. 1999, "In Search of Smoking Guns: What Makes Income Inequality Vary Over Tim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 Hobsbawm, E. 1987, *The Age of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ILO 1997, *World Labour Report 1997—1998*, Geneva, ILO.
- 1999,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Geneva, ILO.
-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8, *Facing Up to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Migration 200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0*, Geneva.
- IMF 200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y 2000. Washington D. C., IMF.
- Jones R. 2000. "Globaliz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The Economic Arguments." Paper for the Workshop on Global Processes of Inequality, Stockholm, October 26—29.
- Kanbur, R. 2000,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Atkinson & F. Bourguignon(eds.),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 1, Amsterdam, Elsevier.
- Kozieniewics, R. P. & Moran, T. P. 1997, "World-Economic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65—1992."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 Kritz, M. et al. (eds.) 199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rugman, P. 1993, *Geography and Trade*, Leuven and Cambridge Mass.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and MIT Press.
- Krugman, P. & Venables, A.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X: 4.
- Londño, J. L. & Székely, M. 1997, "Persistent Poverty and Excess Inequality: Latin America, 1975—1995." Washington D. 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357.
- Luxemburg Income Study, <http://www.lis.ceps.lu>
- Maddison, A. 1992,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ECD.
- Mckeæ, M. 2001,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D. Leon & G. Wat(eds.), *Poverty Inequality and Health*, Oxford, OUP.
- Mari Bhat, P. N. 1989, "Mortality and Fertility in India, 1881—1961: A Reassessment." In T. Dyson (ed.), *India's Historical Demography*, London, Curzon.
- Meldhior, A. et al. 2000, Globalisering og ulikhet, Oslo, Utrikesdepartementet.
- Meyer, J. 2000, "Globalization: Sources and Effects on National Societies and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5.
- Meyer, J. et al. 1992, "World Expansion of Mass Education, 1870—1980."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5.
- Milanovic, B. 1999, "Tru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1988 and 1993: First Calculations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s Alone."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 Miller, D. 1999, "Justice and Global Inequality." In A. Hurrell & N. Woods (eds.), *Inequality,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Oxford, OUP.
- Nussbaum, M. 2000,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CUP.
- O' Rouke, K. & Williamson, J. 1999,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OECD 1997,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OECD.
- 1999,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1998*, Paris, OECD.
- 2000, *OECD Economic Outlook*, June Paris, OECD.
- Nobel e-Museum, <http://www.nobel.se/>
- Paes de Barros R. et al. 2000,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Brazil."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Global Processes of Inequality in Stockholm, October 26—29.
- Patterson, O. 1998, *Rituals of Blood*, Washington D. C., Civitas.
- Przeworski, A. & Vreeland J. 2000, "The Effect of IMF Programs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2.
- Rao, Bhanaji V. V. 1999, "East Asian Economies: Trends in Pover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May 1.
- Rawls J. 1993, "The Law of Peoples." in S. Shute & S. Hurley(eds.), *On Human Rights: 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1993*, New York, OUP.
- Rodriguez, F. & Rodrik, D. 2000,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Dep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 Rodrik, D. 2000, "Comments on 'Trade, Growth, and Poverty' by D. Dollar and A. Kraa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Stockholm October 20—21.
- Sen, A. 1992, *Inequality Re-examin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Social Justi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A. Atkinson & F. Bourguignon(eds.),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 1, Amsterdam, Elsevier.

- Stewart, F. & Berry, A. 1999, "Global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Expectations and Experience." In A. Hurrell & N. Woods(eds.), *Inequality,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Oxford, OUP.
- Therborn, G. 1995, *European Modernity and Beyond, The Trajec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1945—2000*, London: Sage.
- 1999, "The Atlantic Diagonal in the Labyrinths of Modernities and Globalizations." in G. Therborn(ed.), *Globalizations and Modernities*, Stockholm, FRN.
- 2000a, "Globalizations. Dimensions. Historical Waves. Regional Effects, Normativ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5.
- 2000b, "Global Processes of Inequ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Global Processes of Inequality, Stockholm October 26—29.
- Tilly, C. 1998,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UN 2000a, *The Stat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2000*, internet edition.
- 2000b,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UNCTAD 1999,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 Geneva.
- 2000,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 Geneva.
- UNDP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Geneva, UN.
- UNICEF 1994, *Crisis in Mortality, Health and Nutrition*, Firenze, Unicef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
- Wade, R. 2000, "Developing Countries' Autonomy in the Choice of Market Institu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What can states do no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ay 4—6.
- 2001, "Global Inequality Winners and Losers." *The Economist* April 28.
-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 vols. so far.
- Walzer, M. 1983, *Spheres of Justi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Wood, A. 1994,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97, "Openness and Wag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atin American Challenge to East Asian Conventional Wisdom."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
- World Bank 197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8*, New York, OUP.
- 199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OUP.
- 1994,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New York, OUP.
- 1998,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OUP.
- 1999,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internet ed.
- 2000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New York, OUP.
- 2000b,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 C.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0, *Annual Report 2000*, Geneva.

译者覃方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楠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罗琳